

中东剧变、影响及其应对

从建构主义视角考察阿以冲突的缘起、困境及其出路*

王广大

摘 要: 阿以冲突是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之一,对当今国际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阿以冲突的根源在于阿以双方都建构了自己是巴勒斯坦主人的身份认同,都要求独占圣城耶路撒冷。阿以冲突的历史起源和直接原因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形成的敌对性文化观念的不断自我实现和自我加强导致阿以双方的敌对身份不断强化,致使阿以冲突陷入困境。本文从建构主义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阿以双方若要改变“互为敌人”的身份关系,首先应建构积极的和新的“共有观念”,努力增加互信,实现和平共处。

关键词: 建构主义;阿以冲突;阿拉伯人;以色列人;中东和平进程

作者简介: 王广大,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6-0024-06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一般科研基金项目(2010114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支,建构主义突出人的能动性、文化的力量和社会性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结构”包括物质力量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后者系指指导行为主体作为的信仰、规范、观念、认知等,它是确认国家利益、驱动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因素的主导作用,因为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把观念剥离出去,单纯的权力和利益是很难解释国家之间关系的。阿以冲突固然有领土边界、水资源分配等物质力量结构因素,但深刻的观念、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意识结构因素更为重要。建构主义为解读阿以冲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也为化解这一矛盾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阿以冲突的缘起

从观念层面上看,阿以冲突的重要根源在于阿以双方都建构了自己是巴勒斯坦地区主人的身份认同,都要求独占圣城耶路撒冷。然而,在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运动产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和睦相处的,他们的冲突只是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产生。

1. 阿以双方都建构了自己是巴勒斯坦地区主人的身份认同,都要求独占圣城耶路撒冷。身份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建构主义就是身份政治理论。“身份

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这是建构主义关于身份与利益关系的重要结论。”^[1]因此，身份、观念、认同决定利益，有什么样的身份、观念和认同，就有什么样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又决定了不同的行为。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曾先后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主人。尽管犹太人曾先于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统一的王国，但阿拉伯人也长期生活在巴勒斯坦。正是这种对同一片土地的相似的身份认同和“独占”情结使阿以双方的利益完全对立起来，确立了双方的敌对（利益）关系（认同），使他们的冲突成为一种“零和游戏”——只有消灭对方才能保全自己。这一身份认同建构了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即都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族国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阿以冲突发生的必然性。

从观念层面来看，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历史上，巴勒斯坦是犹太圣经的产生地或曰犹太民族的宗教发祥地，犹太人始终认同巴勒斯坦就是《圣经》中说的应许之地。现今耶路撒冷依然有犹太民族英雄所罗门建造的耶和华圣殿遗址，即现在犹太人凭吊他们悲惨历史的“哭墙”。这里是犹太人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归宿之地，是他们经过两千年流亡生活为获得救赎而祈祷和向往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被视为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和犹太民族往日辉煌的象征。因此，犹太人虽然历经两千年的流散，但“回到耶路撒冷”一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显然，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认同是近代犹太复国主义最终确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原因所在。犹太人眼中的“圣城”，也是阿拉伯人心中的圣地，更何况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宗教情感丝毫不亚于犹太人。从公元634年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以来，这里长期处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穆斯林认为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由麦加夜行到此登霄并接受真主启示的地方。闻名于世的岩石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受穆斯林崇敬的程度仅次于麦加天房和麦地那穆罕默德陵墓。伊斯兰教律规定：“去阿克萨清真寺朝觐，安拉会赦免他的罪过”；“死在圣城犹如死在天上”；“在阿克萨清真寺礼拜相当于在其他普通清真寺礼拜500次的功德。”^{[2]29}因此，耶路撒冷也是穆斯林向往的圣地，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牵动着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神经。

总之，阿以之间数十年冲突的根源在于历史的发展建构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认同，建构了双方都想独占耶路撒冷的观念。犹太人坚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阿拉伯人坚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完全符合建构主义“认知和观念决定行动”的理论。

2.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阿以冲突的历史起源和直接原因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确定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亦非天敌，他们只有在双方的认知发生冲突、进而导致利益发生冲突时，其关系才会变得日趋紧张，进而导致较大规模的冲突。

尽管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观念上都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的主人，都要求独占圣城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之前基本上能够和平共处。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初的时候，阿拉伯人也没有与犹太移民发生激烈的冲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犹太人开始了有计划、大规模的移民，一步步向着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目标努力。随着大批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势力扩张对该地区阿拉伯人的生存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时，阿犹矛盾开始激化了。对此，甚至是犹太学者也认为：“阿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将几十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肯定将在那里引起根本变化，致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陷入痛苦境地。”^{[3]726}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的悲剧在于当他们想要建国的時候，世界版图上已不再有无人居住的地盘，因此无论犹太人在哪里建国，都会与当地发生冲突。当他们把历史上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作为在此建国的合法性依据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迫成为与其冲突的另一方，而且正是在与犹太人的冲突过程中认识到自己“巴勒斯坦主人”的身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们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维护自己的身份，不得

不与以色列人为敌，甚至使用暴力手段。然而，以方又以此为借口，加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迫害，从而导致冲突不断升级。

二、阿以冲突的困境

建构主义认为，认知和观念会决定行动，行动会产生后果，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又会对行为者产生影响。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使阿以矛盾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并逐步建构了双方“只有消灭对方才能保全自己”的共有观念，这一共有观念促使阿以之间先后爆发了多次战争。以色列建国之后的多次阿以战争产生的严重后果又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人心中“阿拉伯人就是我们的敌人”的理念和阿拉伯人心中“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敌人”的理念。因此，阿以战争建构了“互为敌人”的心理观念，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阿以冲突。多年来，阿以冲突处于一个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之中。从表面来看，冲突之后是谈判，谈判失败之后又陷入新一轮的冲突之中。从观念层面来看，每次谈判都会燃起一线希望，而希望破灭之后带来的是进一步绝望，这种绝望又会催生新一轮更激烈的冲突，然后再进行谈判，又萌生新的希望，新的希望似乎又会导致更激烈的冲突。怪圈不破，暴力行动、以暴制暴、定点清除、武力屠杀就不会停止。^[4]实际上，阿以双方已经处在一种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这种“敌对互动”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陷入建构主义者描述的霍布斯式的无政府体系之中，即国家之间的身份是敌人，它们的利益是消灭对方，其国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战争。在这种“人人为战、相互为敌”的状态之中，要使阿以任何一方放弃这种霍布斯文化并非易事。

对于阿以冲突的困境，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建构主义认为，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当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就产生了结构（即共有观念）。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它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它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威胁的存在，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具有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强化的倾向。从阿以关系来看，历史形成的敌对文化观念的不断自我实现和自我加强导致双方敌对身份的不断强化，已成为阿以冲突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阿以关系陷入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双方严重缺乏互信。正如建构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在互信缺失的情况下，一国在寻求国家利益时遵循“理性自私”的原则行事，结果往往陷入困境之中。建构主义强调国际政治中行为体从主观上推测自己和对手，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可预知的、再造的行为模式。处在敌对关系中的阿以双方都把对方视作一种威胁，“一方几乎总是认为另一方居心叵测，通常可能具有最险恶的动机。”^{[5]66}就这样，严重缺乏互信的阿以双方没有任何安全预期，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互相采取暴力的行为方式，结果就是双方长期深陷暴力冲突的困境之中。

三、阿以冲突的解决途径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双方就深陷暴力冲突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阿以双方进行多年的和平谈判，也许能够解决建构主义者所谓的“物质力量结构”范围内的多种问题，但是双方各自内化的“互为敌人”的观念和长期暴力冲突导致的情感“积怨”却是条约和协议难以消解的。那么，

建构主义能为解决阿以冲突困境提供怎样的途径呢？

1. 改变阿以“互为敌人”的身份认同关系

如前所述，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决定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互动既能使旧身份不断巩固，也有可能使已经形成的旧身份瓦解、新身份确立。

半个多世纪的流血冲突使双方都认识到“阿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灭另一方”、“战争解决不了阿以冲突”、“战争已变得毫无意义”，甚至也都意识到“战争使双方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战争是无益的”、“和谈是唯一出路”。与此同时，双方民众期盼和平的意愿与决心不断增强。阿以双方这种新的观念应该建构出他们各自新的身份和利益。因此，阿以之间的“互为敌人”的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宿命。至少可以说，当前的阿以双方在相互关系的界定上存在着多种可能的选择，而不必然是敌对关系。事实上，阿以双方能够坐到谈判桌前本身就说明他们正在走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式的状态，双方开始摒弃“敌对”关系。1991年马德里和会的召开标志着和平谈判已成为阿以关系的主旋律，冲突已退居其次，甚至成为胁迫对方让步的手段而已。因此，阿以双方现阶段更像是处在建构主义者描述的“洛克文化”之中，即国家之间的相互身份是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是暴力的使用是有限度的。

2. 建构积极的和新的“共有观念”是阿以和平的关键所在

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之间知识的分享程度造成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分享程度越高，行为体彼此越相互信赖。因此，相同文化和观念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合作，而不同文化和观念的国家之间更容易排斥，甚至会发生冲突。事实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仅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生物基因，而且拥有一脉相承的宗教传统。^[6]因此，阿以双方不应是对立的两个民族，而是有共同民族起源、共同发展历史的两个民族，双方之间应追根溯源，从共同的民族起源发展认同感，或者努力从各方面挖掘、培养共有的认同感。

阿以双方建构积极的和新的共有观念需要各种宣传工具的积极配合，如媒体、教科书等。首先，媒体是形成公共舆论、引导公共认知的重要平台，在阿以交流、沟通中担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媒体要尽可能地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努力创造一个适合解决阿以冲突、进而促进阿以和平的舆论环境。与此同时，媒体要将对方形象进行“去妖魔化”的客观处理，让双方的公众看到，阿拉伯人并不是“恐怖分子”，犹太人也不是“侵略者”。尽管阿以在历史、文化、语言、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双方一定要把对方正确看待”，双方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调和。为此，阿以双方可以通过媒体来传播彼此间的共同点，以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激发双方对彼此的认同。当然，媒体还应该注意防止出现催化民众激进情绪的情况。其次，各国的教科书在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敌我观等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在阿以双方的教科书中都找到了积极的内容。以色列的很多教科书中都表达了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实现和平的愿望。^[7]巴勒斯坦新的教科书删除了反犹主义内容。他们并没有试图将以色列抹去，否认其合法性……每一本书的前言都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称为‘家园的两个部分’。^[8]更为重要的是，由阿以双方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的公共教科书已经面向全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公开发行，这既有助于增强双方的相互了解，也有利于他们建构新的共有观念。

此外，阿以双方有识之士还应共同谋划中东地区的未来发展蓝图，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需要共同面对的敌人，逐步培养全民族新的共有观念，形成共同利益，最终建构双方“互为伙伴”的新的身份认同关系，建设和平、繁荣的新中东。

3. 建构（战略）互信才是推进阿以和平的根本出路

一般而言，只要两个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存在军事对抗的危险，就有必要建立战略互信。对于正在或者设法走出“零和游戏”敌对状态的行为体而言，逐步增进战略互信显得尤为重要。“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8]所以，敌对的双方应该可以逐渐增进互信，乃至最终建立互信。从建构主义角度看，国际体系文化是国家互动的行为所造成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两个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相遇，可能成为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行动和对这种行动意义的理解。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并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威胁的信号，安全威胁就会产生，安全困境便得以确立。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友好”，并发出同样友好的回报信号，则不会出现安全威胁和安全困境，双方甚至可以形成安全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霍布斯文化中的安全困境还是康德文化中的安全共同体都不是无政府体系固有的，而是被行为体的互动行为建构的。可见，只要国家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互不信任的主体间认识，建构起安全共同体，就可以消除安全困境。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导致了阿以相互之间主观上的猜疑和不信任，现阶段还难以建立一种集体认同意识。但阿以双方只要能够进行恰当的交流 and 沟通，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保证安全的互动，培育一种不以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的共有观念，就能使共享的认知结构最终建立一个“安全共同体”。近年来阿以和谈多次陷入僵局都是因为缺乏互信造成的，因此，建立互信尽管需要双方做出长期努力，但仍是阿以双方走出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

阿以双方建构互信，一方面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领导人。领导人的观念认定及其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本国的舆论走向和国民的政治态度。因此，领导人互信关系的建立是进一步改善阿以关系的基础所在。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其著作《新中东》中对阿以关系的未来进行了积极的展望，他认为消除阿以双方互相猜疑、嫉恨的心理障碍是“寻求中东和平与繁荣的努力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4]66}。另一方面需要双方知识阶层和社会精英阶层发挥积极作用。作为专家身份的学者在介绍民众相关国际态势与国家关系时应更加客观、公正、积极，让国民能意识到哪些举动将有利于长远的国家利益，哪些做法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特别是在两国关系陷入僵局时，学者要呼吁民众努力保持冷静，以大局为重，避免两国关系陷入霍布斯状态，促使双方民众尽可能理智、客观地看待对方。经过长期战乱，阿以双方的民众大都已经厌倦战争、渴望和平，但他们需要通过更多的交流了解对方、认识对方、信任对方。

当然，在解决阿以冲突、实现中东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双方都要高度警惕极端分子的破坏行为，无论是针对平民的袭击还是针对各自领导人的恐怖事件。近年来，在中东和谈进程不断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历史大背景下，极端分子依然不断破坏阿以和谈，摧毁阿以建构的脆弱的互信。因此，阿以双方均应意识到现阶段阻碍他们实现和平的共同敌人之一就是极端分子和极端主义。

四、结语

建构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过度推崇、甚至夸大了观念和文化的作用，但却创立了以观念和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体系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错综复杂的阿以冲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为进一步推动阿以和谈注入了新的动力，为破解“以暴制暴”的困局、彻底解决阿以问题提供了根本出路。尽管阿以问题还面临着诸如耶路撒冷最终地位、巴以边界划分和数百万巴难民回归等更为棘手的具体问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阿以双方努力建构正面、积极的新共有观念，不断增进互信，阿以和平共处于中东大地定能实现。

[参考文献]

- [1] 薛力. 中国对东盟的外交: 一种建构主义的剖析[J]. 香港中文大学 21 世纪双月刊, 2009(12).
- [2] Abdallah El-Khatid. Jerusalem in the Qur'an[J].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1,28(1).
- [3] 沃尔特·拉克. 犹太复国主义史[M]. 徐方, 阎瑞松,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 [4] 杨福昌. 解决巴以冲突的难点及其相关思考[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3).
- [5] 西蒙·佩雷斯. 新中东[M]. 辛华,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4.
- [6] 王广大. 本是同根生——兼论早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问题[J]. 世界民族, 2005(2).
- [7] Arabs and Palestinians in Israeli Textbooks [EB/OL]. [2010-09-21].
<http://www.ecomtrade.co.il/eMall/shops/1559/imgbank/Israeli%20Report%20-%20September%202000.pdf>
- [8] Nathan Brown. Study of Palestinian Textbooks[EB/OL]. [2001-11-01].
http://www.reference.com/browse/Palestinian_textbook_controversy.
- [9] 牛新春. 中美战略互信: 概念、问题及挑战[J]. 现代国际关系, 2010(3).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Roots, Dilemma and Solution

WANG Guangda

Abstracts Arab-Israeli conflict is one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World War II,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rom the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Arab-Israeli conflict is rooted in the two sides' construc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Palestine, and the requirement of exclusive occupation of the Holy City of Jerusalem. The historical root and direct cause of Arab-Israeli conflict is the Zionist movement. The self-realization and self-reinforcement of the historically formed hostile cultural values led to the continual strengthening of the two sides' hostile identity, resulting in troubled Arab-Israeli confli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two sides can not only change the hostile relationship, but also should actively build a new and positive common concept between them, make efforts to increase mutual trust, in order to achieve peaceful coexistence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Constructivism; Arab-Israeli Conflict; Arabs; Israelis;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责任编辑: 李 意)